

论朱元璋帝王权力对士人身份认同的改造

——基于《明太祖集》的考察

沈润冰

(中央财经大学 文化与传媒学院, 北京 102206)

摘要:作为明朝开国帝王,朱元璋以其强权手腕塑造、改变士人群体的身份认知。《明太祖集》集中反映了其对士人身份认同的改造,如采用废相举荐、训诫评判、文学批评等手段,强化君权构建,削薄士人原有的自由独立品质。洪武士人为迎合统治者创作了大量馆阁、颂圣之章,鸣盛之余却也反映了其忧惧心理。朱元璋对士人身份认同的改造本质上是巩固皇权统治、维护王朝权威的需要。

关键词:朱元璋;《明太祖集》;士人群体;身份认同

中图分类号:K24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390(2020)01-0033-04

士人是中国历史上极为独特的一大社会阶层,被赋予了特殊的社会属性^①。他们拥有知识分子之所以成为知识分子的主观凭借,以其丰厚的文化修养、深刻的学术思想及宏伟的理想抱负致力于思想启蒙、国家发展和社会转型。隋唐以后,士人群体大多通过官方政府选拔的方式获得政治身份,并以此参与到文化构建与政治建设实践之中,实现其匡扶社稷之理想。“在帝制政治框架内,由科举入仕的士大夫群体依托皇权管理国家”^[1]可以视为这种士人政治模式的注解,同时它也一语道破其背后深蕴的士人身份的特殊性。从《明太祖集》中可以窥见朱元璋以其高居帝王之位的政治、文化权力强力改造士人群体,颠覆其原有的阶层身份认同的情形。《明太祖集》为朱元璋之御制诗文集,共二十卷^②,为开国文臣刘基、宋濂及翰林学士乐韶凤所编录,后由文吏姚士观、沈铁等人予以校刊,内容多以诏、制、诰、敕为主,除应用文外,还存有论、文、碑、记、说等更能体现朱元璋思想情志的文章,另有两卷诗歌创作^[2]。从个人修行及传世文集来看,不得不说朱元璋个人文化转型是成功的,他从知识文化水平较低的底层贫民最终一跃成为明儒知理、颇通文采的君王,甚至还有诗文集存世。朱元璋的诗文总体上与一般文人有相似面目,特别是在诗之创作上,可见其对于艺术的追求与雕琢,如《叹秋》云:“风声落木深

秋意,云影垂天印日阳。闲看满川黄菊蕊,因风摇动暗浮香。”^③但依情理推测,该文集中的作品免不了馆阁文臣的修饰与润色。不过,这些作品中值得称道的佳句妙语,更多是能在粗疏文字中自成豪雄气势、彰显其布衣天子的独特气象,如《征陈至潇湘》的“东风吹醒英雄梦,不是咸阳是洛阳”、《不惹庵示僧》的“山僧不识英雄汉,只恁哓哓问姓名”等。从中不难发现,朱元璋在文学创作上未能与士人群体共争日月,其诗文仍然充溢朴质气息,如律诗中间两联还使用“自从南向北征去,直到如今永不来”这般通俗直接的言语。由此观之,朱元璋并非如南朝梁萧纲、南唐李煜这类独占文坛鳌头的帝王领袖,其对士大夫文人群体的领导并非来自超逸的文学才能,更接近于一种因帝王身份而具备的政治地位、经济资源所形成的权势压迫,并由此投射到思想文化学术领域,强有力地改变了士人群体与帝王群体之间约束、制衡的关系互动,甚至在深层文化思想场域深刻地影响了洪武时期的士人阶层认同。

一、收归君权的政治选拔

从政治层面考量,朱元璋于洪武十三年(1380)借胡惟庸案下诏,废除持续多年的丞相制度,使六部直接听命于他。早在此前,朱元璋就已经忌惮日益膨胀的相权。他在《敕问文学之士》中说:“臣张君之威福,乱自秦起,宰相权重,指鹿为马。自秦以下,

人人君天下者，皆不鉴秦设相之患，相继命之，往往病及于君国者……”可见，其对相权制约君权有着清醒认知。虽然废相属于政治建制，但丞相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为士人群体在参政层面上的最高领袖、首领^④。宋人便多以文人士大夫与君共治天下为基本政治信条，在朝堂政治之中饱含高昂士气，拥天下以为己任。丞相是士人群体志切匡扶、济世安政之精神领袖，更是制衡帝王权力的实操者。由此观之，废相的本质是在政治层面宣告只有帝王方可作为士人群体之领袖，并从精神文化角度告知士人天下属于朱家，士人不过是协助、参与的陪衬角色，并非占据天下之所有权，这就在无形之中消解了士人原有的“共治天下”的理念认同。

《明史·选举志》序言有云：“选举之法，大略有四：曰学校，曰科目，曰荐举，曰铨选。学校以教育之，科目以登进之，荐举以旁招之，铨选以布列之，天下人才尽于是矣。”^{[3]1119}对《明史·太祖本纪》中的相关措施（元至正十九年至洪武二十六年）进行梳理，可知建设“学校”有四次，使用“科目”之法则有五次，“铨选”有两次，而以“荐举”招揽人才则有八次。自洪武元年（1368）时“征天下贤才为守令”，至洪武二十三年（1390）时“授耆民有才德知典故者官”，可见朱元璋之于“荐举”的偏好与善用。明洪武时期官员的选拔渠道具有多样化的特征，而朱元璋大量的下诏荐举，一方面透露出王朝肇始时期对于人才之渴求、文教之推崇，从《谕举到人材》《谕幼儒教》《谕太学生》等文同样可见其作为统治者的求贤若渴之心，这无疑具有积极意义。但另一方面，史籍上对其荐举的大量记载间或说明其在选举方式上对荐举的偏爱超越了科举。正如商衍鑾所言：“世之言科举者，谓其使草野寒酸，登进有路……然究其旨，实欲举天下之贤志才能，咸纳于其彀中……”^[4]事实上，不论古今，选拔人才的人事权力在官宦政治之中十分关键。换句话说，谁能紧握选拔权力，谁就能在某种程度上掌握朝政之命脉，因为这种权力把控了中国古代士人最主要的生计门径，紧攥普通士人谋致青云、寻得飞黄腾达的根本契机。相较于科举，荐举这类选拔方式因他人举荐、当堂策问而沾带更浓厚的主观评判色彩，仅在形式上便更直接明显地带给统治者“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的强烈掌控之感，进一步让统治者完完全全地操控选用官吏之决定权。

另外，朱元璋还在诏令中明确指出：“今贤士多隐岩穴，岂有司失于敦劝欤，朝廷疏于礼待欤，抑朕寡昧不足致贤，将在位者壅蔽使不上达欤？”^{[3]14}从

古至今，如许由、巢父、伯夷、叔齐、陶潜等，在野隐士大多是对时政失意走向山林的士人群体代表，他们选择归隐山林，终身不仕，追求自由性灵的精神净土，某种程度上可视为与朝堂的无声“对抗”，同时也开创了归属自身自由、不为君王控制的隐士精神文化传统。但朱元璋以其帝王权力终止隐士最后的隅抗，甚至对不为君用的士人群体加以治罪，他说：“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是自外其教者，诛其身而没其家，不为之过。”这是朱元璋对广大遁世士人的一种清算手段，他在《严光论》中甚至斥责隐士为“当时之罪人，罪人大者莫过严光、周党之徒，不正忘恩，终无补报”，栖岩滨水，耽于自乐，沽名钓誉，未能尽心竭力于朝廷国家。他的《僧道竺隐说》对栖身庙观的僧道人士也有讥词，鼓励僧道人士出仕而利济群生。在朱元璋笔下，虚拟人物“非先生”口中的“生杀予夺，惟君专之而又能之，安敢隐乎”，实乃其对广大隐士的警告与申饬。不论是选举方式多加察举，抑或对待隐士的严苛^⑤，朱元璋对出仕者与不仕者均握有生杀大权，体现其作为帝王而以权力扭转士人群体旧有的阶层认同观念，实质是对隐士群体不与统治阶层合作而选择避世心态的颠覆。

二、忠君价值的训诫评判

朱元璋还在文化精神领域试图以意识形态工具融入价值评判，逐步推进士人群体的身份改造工作。朱元璋在位期间，颁布众多训诫导引的例令书册以寄予对于不同人群的规劝（包括后妃、内臣、子孙以及天下百姓等），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士大夫群体的训诫。洪武十三年，他命人分别编《相鉴贤臣传》和《相鉴奸臣传》。洪武二十三年，作《昭示奸党录》布告天下。洪武二十六年，颁《逆臣录》于天下。这些书录的颁布以帝王价值观为内核，以皇权为依靠，以著书立说为形式，本质上为皇家价值导向工具。细究其道德训诫的精神核心，则主要为忠孝观念，因为忠孝最为朱元璋所看重。《谕江夏侯周德兴》有云：“昔君之武臣，有忠于君者，尽其筋力之劳，所以为君御灾捍患，至身终而后已。”《谕恋阙臣僚敕》亦云：“尝闻古有贤士，忠不舍君，意不欲离，虽死不忘，所以谓之忠也。有等误遭责灾君，不能释其忠臣之志也，犹不嗟怨。”在朱元璋眼中，忠是为人臣子最基本的道德标准与生命守则。诚然，忠确乃道之要津，但这一字所承载的道义分量应辨明其所效忠之主体。朱元璋所推崇之“忠”，其忠之主体必定为“君”，而非孟子等人所提倡之“国”与“民”。

他曾在诏中说：“所以事不能忠君，身不能孝亲，往往覆命者若是”，极力注重孝道的遵循与弘扬。若对比《相鉴贤臣传序》的一段论述，则更能深刻领会其倡“孝”的本质。朱元璋认为，孝为忠之根本，二者相互牵连，忠于君主而不为奸邪主要源于孝敬之功，忠君同时亦能行其孝道。若无忠君，那么因犯事而父母、祖宗连诛，实则悖逆了孝道；若无尽孝，那么势必不惧连累父母，而敢行奸贼僭君之事。可见，朱元璋所倡导的价值导引实为忠君观念的文化延伸，此有意之训诫是助于意识形态建设的一个文化工具。当然，观念的渗入大多呈现绵软纤和的特点，并非能完全取得实际功用。因此，他便挥舞起权力，以炮制血腥的手段确保训诫观念的落实^⑥，从而加深对于士人阶层在忠君文化价值上的认同及框缚。

三、权威化的文学批评

即使在士人群体最能驰骋自由、加以发挥的文学领域，历经“文化蜕变”的朱元璋同样不甘示弱，试图在文学领域指点文豪江山，大发自成机杼之言。作为人主，朱元璋具有相当的自信，指挥士人以怎样的形式去开拓文学，他览群儒之作而觉索然无味，假托臣子口吻，写就《阅江楼记》。其中，他甚至对前代被视为文学巨匠的韩愈、柳宗元加以批评驳斥，似有欲与逞力之势。他的《驳韩愈颂伯夷文》批驳韩愈的《伯夷颂》，认为韩愈为文存有瑕疵。韩愈对伯夷的赞词云：“若至于举世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则千百年乃一人而已耳；若伯夷者，穷天地、亘万世而不顾者也。昭乎日月不足为明，崒乎泰山不足为高，巍乎天地不足为容也。”^[5] 韩愈其实是以对比夸张之手法来称颂“特立独行”“不顾人之是非”的伯夷，以蕴气势。对此，朱元璋不以为然，认为韩愈夸耀伯夷而“过天地，小日月”，为追求“文雄、句壮、字奥”而漠视自然客观道理，显得十分气妄。同样，他的《辩韩愈讼风伯文》也认为韩愈“欠博观，明道理，格物致知犹未审其精”，进而认为韩愈以风比拟奸人之举是对神灵自然的怠慢与亵渎。洪武十二年，朱元璋观幼儒习学，特命其进先儒古文或四书一章，并且每日在御前讲习。他对柳宗元的山水小品《邕州马退山茅亭记》对兄长柳宽修葺茅亭大兴土木、残害民力不加规谏，反而歌咏亭台流丽之美大为不满。《设大官卑职馆阁山林辩》则虚构了耐久道人和内黄县令沈仁的为文之辩，这两人都具名望与文才，因而匍匐求文之人如过江之鲫。但这两人的文风以及署名则大相径庭，前者留“耐久道人”，后者留“内黄

县令”，前者是山林之气，后者是馆阁之风。文章最后借耐久道人遭批评、遇轻侮之事，向士人宣示馆阁诗文才是文章正统。

从上述文章中，不难发现朱元璋的文学观与倾向偏好。他在文学创作上的倡导，或者说对于文学的指摘、干涉，一方面体现的是实用政教的文学观，高举“为文要有补于世”的义理大旗，批评单纯审美的虚辞，追求文学的政治教化功能。另一方面，其文似乎在字里行间都涉及一种尊卑有别的思想倾向，指斥韩愈的两篇文章核心都是某种至高无上的事物权威在韩愈笔下遭到了文学审美的艺术消解。朱元璋认为，日、月、风地位尊高，“不使高而下，低而尊”，而韩愈属文时未将日、月视为天地之二极，未能拜崇其至高无上，反而以此来比拟隐于山林、沽钓名誉的伯夷。咀嚼其辞，这些所谓的日、月、风确为世间自然道理所树立的权威，但文学世界本求艺术加工后的特殊审美效果，而能利用文笔手段将其权威性边缘化，在这里，朱元璋却扭正这种别具匠心的艺术创作原则，将其权威化、客观化的理念印刻入文学圈中。《设大官卑职馆阁山林辩》则更甚，对“轻君爵而美山野”加以谴责，高官爵之文，低山林之文，是其重视君爵的入世政治观在文学上的反映。明王朝建立之初，儒士对于朱元璋政权存在一定的认同困境，特别是元代遗民，采用“北投元朝”“力绝征聘”“归隐山林”等手段表达排斥，朱元璋对此有清醒的认识，采取措施应对，并撰写《设大官卑职馆阁山林辩》《严光论》等文表达不满^[6]。这种不满是有意为之，是以帝王的官方意识形态对士人群体在文学创作上强有力的认识塑造，试图影响其行文时持有的文学导向，甚至以此达到思想的训忠之效。

四、士人群体的容受

在朱元璋施加如此之多的或政治制度或思想文化上的改造厘革后，再从士人群体的接受层面加以考察，可知士人群体的阶层认同确实有所改观，而这在明初文坛反映得较为明显。作为一国之君，朱元璋创作了大量歌咏盛世、粉饰太平的诗歌，如《春日钟山》“棘彝盛蟠科，寰宇乐民生”、《莺啭皇州》“神州气象寰中盛，天阙风光世上明”、《钟山云》“天开万载兴王处，地辟千秋永朕京”等。可见，朱元璋的文学愿景带有雍容恢丽之声，反映其一种题旨偏好与审美取向，体现前述带有等级色彩的馆阁诗文观。

为迎合、应和统治者，士人群体只得创作同类馆阁之章。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于洪武三年时所编诗文集《雅颂正音》所述：“要其春容谐婉，雍

雍乎开国之音，存之亦足以见明初之风气也。”^[7]“开国文臣之首”的宋濂就曾在《汪右丞诗集序》中阐明“台阁之文”相较于“山林之文”之优在于“壮、懿、雄、盛”，可见其当时所持的文学基调与朱元璋似有合拍之意，同时他还创作出大量颂圣记功的“台阁之文”^⑦。除各式各样的赞、颂这等本具应制功用的文体之外，甚至在绘游丽日、清涤心境的游记之中也不时怀有颂圣台阁之辞，如“今仲远雍容于观眺之际，亦曰帝力难名，而吾民恒获遂其生尔”^{[8]121}“盖帝力如天，拨乱而返之正，四海致太平已十有余年矣”^{[8]160}。刘基也有类似之作，其为苏伯衡文集所写之序就强调“国家之兴，土宇之大”^{[9]88}，《清斋记》更是将斋之清明归因于圣明太平，诗歌中亦有“皇恩重丘山，有愿俾克伸”之句^{[9]87}。高启于洪武二年应召修元史而赴金陵（今江苏南京），在其留京时期，也有《登金陵雨花台望大江》《晚登望都邑宫阙二首》《禁中雪》等弘扬圣治、咏叹昌荣的诗歌，笔力雄健，势满乾坤。即便是当时的山野隐士和遗民群体，也有此类创作，如陶安《赠刘汝弼归京》、吴志淳《春日遣怀》、杨维桢《舟次秦淮河》等。当然，这种带有馆阁、颂圣意味的文学作品，不全是虚与委蛇之作，或有可能是发内心真实之声以鸣一代鼎盛。还原其人其时，结束战乱而天下太平的新兴王朝怎能不会为敏锐细腻的文人扩其胸腔气势、增其河山壮豪情怀呢？特别是对于身居文臣儒士前列的宋濂、刘基等人而言，其特殊地位怎不会在潜移默化中以位置之特殊性而进一步熏染其创作呢？馆阁文学创作的背后确有较为复杂的因素，今人其实无法脱离人性与历史情境而苛责馆阁文学。

除新兴太平的国朝气象给予诗人真实的创作源泉这一点之外，消解帝王对于文人的压制与诛杀或许是另一层原因。明初，郑玉、王翰因不愿入仕自裁而死，苏伯衡、高启等入仕也遭下狱处死，典雅敦厚的鸣盛背后暗藏着悄无声息的杀机，震慑其他士人的处世心理与身份认同。正如赵翼所言：“盖是时明祖惩元季纵弛，一切用重典，故人多不乐仕进。”^[10]刘基亦曾隐约表达其忧惧心态：“探珠入龙堂，生死在一瞬。何如坐蓬荜，默默观大运。”^{[8]374}可见，不论是出仕或在野，士人群体谨小慎微、如履薄冰的心态，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一种被皇权政治挤压后身份认同的心理折射，饶龙隼先生称之为“望乡心态”^⑧。洪武时期的士人群体逐步消退以往士人那种或匡扶天下或特立独行的理想主义品质，志气之火为帝王所浇灭，取而代之的是无力抗衡帝王政

治文化权力后的种种忧惧。士人群体的这种心态无疑是朱元璋所乐于见到的，不论这些士人是否真心实意尽忠竭力，至少表明他对于士人阶层身份认同“矫枉”的成功。士人不再肆意地以思想文化的飘逸张扬而跳脱君王手掌，君王却能挫其羽翼、杀鸡儆猴，将其控制于自己的权力之下。随着时间的推移，功臣剪除、文人罹难，鸣盛壮丽的文学景象逐渐被朱元璋所扼杀，取而代之的是人人自保之下的衰落与颓靡。

五、结语

朱元璋废除了标志着士人领袖的丞相，“射人先射马”地从士人阶层首领的手中收回统御宇内的精神所有权，在士人心理上施以一击。再从选举制度与选举方式上攫取实权，并对山野隐士的避世行为加以制裁。这些举措改变了士人群体的阶层身份认同，依凭其强大粗暴的帝王权力将士人原本的阶层身份认同由“士人与皇帝共治天下”变为“士人为皇帝治理天下”，由“士人栖居山林可不为君用”变为“士人即使栖居山林亦得为君所用”。同时，朱元璋以训诫忠君意识和馆阁权威文学为文化工具，在士人的阶层认同加上了“忠于君主”和“馆阁颂美”的意识因子。这固然强化了士人群体忠君、爱国、孝亲之意识，潜移默化地实现了儒家价值之教化，但也导致了士人群体普遍持有明哲保身的心态，磨灭了其原本特立独行、高洁傲岸的品格，可谓对士人精神的麻痹与戕害。

注释：

- ①对中国士人群体的界定，虽有区别与争议，但大致以余英时先生的观点为主。士作为承担着文化使命的特殊阶层，自始便在中国历史上发挥着“知识分子”的功用，另外它还是一个“未定项”，具有一定的社会属性但并非为社会属性所完全决定而不能超越。以此观之，士人可以是有官职的具有政治身份的“士大夫”，也可以是没有官职的“隐士”等。在某种程度上说他们都具备士人群体占据文化资本、拥有道德理想、影响文化传统的特点。参见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2、8 页。
- ②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六十九集部二十二：“然所谓三十卷者，今未见传本，其存佚均未可知。”可见或存有三十卷本，但未见传本。
- ③本文所引朱元璋诗文，均出自胡士萼点校的《明太祖集》，黄山书社 1991 年版。
- ④一般认为，丞相为士人群体于朝堂政治之中的领袖，主要是由其特殊的政治地位决定的。除政治以外，也有凭借文学、道德成为士人群体精神领袖的存在。

（下转第 51 页）

方式感知世界和感知自身的一个重要坐标”^{[4]102}。讲解员大赛除了为大家提供一份真实,更重要的就是有声语言带来的这份认知、思想、情感的力度。

“戏剧家以艺术手段来铸造观众审美感知的变异,有着各种目的。有人希望通过变异,给观众带来一些陌生感和阻隔感,使他们兀然惊起,获得在平时熟视无睹的人生要旨;有人希望通过变异,筛去不美的杂质,扩大美学色素,由净化而达到美化;有人则希望通过变异,把某些更能体现本质的外相加以突出,使生活形态更深刻地呈现在观众面前。”^{[4]97}所有这一切,由个体通过风格来演绎并展现,接受与否最终由观者评判,讲解亦然。

四、结语

综上所述,虽在文中将口头语言表达之“术”分成三部分,但这三“术”是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一个系统。这三“术”可自成一脉,分别进行更深入的分析与阐述,但就口头语言表达来说,它们是一个整体,切忌分裂看待、处置。

传统语言学提倡口头语言表达训练的观点有很多,如“以气送声,以声传情,以情动人”,博物馆学强调讲解应“以人为本,以物说话,讲文物背后的故事”,这些观点与要求均与本文所述观点不相悖。

(上接第 36 页)

⑤明初,贵溪儒士夏伯启叔侄甚至剁指不仕,朱元璋大怒“诛而籍其家”。参见《续修四库全书》之《大诰三编·秀才剁指第十》,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862 册,第 328-329 页。

⑥洪武二十七年(1394),朱元璋命刘三吾等对《孟子》一书加以删节,删除以“君视臣如草芥,臣视君如寇仇”为代表的“辞气之间抑扬太过者八十五条”,且不得以此为取士命题。

⑦宋濂对于“台阁之文”与“山林之文”的评判仍需讨论,他是以后人之眼光看待“昔人之论”。其所倡“台阁之文”某种程度上并不等同于当下所理解的仅仅粉饰太平、讴歌盛世的馆阁文学,正如其所述“城观官阙之壮,典章文物之懿,甲兵卒乘之雄,华夷会同之盛”,可见其对“台阁之文”的理解较为宽泛,众多声势豪雄之作亦在其认知范围内。

当然,这也是其“鸣一代之盛”诗文观在文学实践上的反映。

⑧饶龙隼先生曾指出,浙东文人依附朱氏政权后,因朱元璋的威严与猜忌,文人产生复杂的畏惧心态,期盼退居乡园以明哲保身。参见饶龙隼《元末明初浙东文人择主心态之衍变及思想根源》,《文学遗产》2008 年第 5 期。

本文提供的是看待、分析口头语言表达的不同角度,以期多角度带来更全面的认知。

对于博物馆讲解来说,若“道”是魂,是血肉,是目的地,“术”就是帮助讲解员和观众抵达目的地之“路”“桥梁”“手段”,是帮助大家理解“魂”、感受“血肉”的利器。认识讲解之“术”,并熟练掌握之,是一名优秀的讲解员必须要锤炼的,而明确语言之“道”,掌握语言之“术”,运用系统思维科学地认识口头语言表达,不仅是讲解员所需要的,也是每一个人提升口语表达水平的有效途径。

参考文献:

- [1] 口头语言 [EB/OL]. [2019-08-10]. <https://baike.so.com/doc/1365992-1443928.html>.
- [2] 胡明扬. 语言学概论 [M]. 北京: 语文出版社, 2000.
- [3] 徐世荣. 普通话语音知识 [M]. 北京: 文字改革出版社, 1980.
- [4] 余秋雨. 观众心理美学 [M]. 北京: 现代出版社, 2012.
- [5] 寇鹏程. 美学与人生 [M]. 重庆: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
- [6] 黑格尔. 美学: 第一卷 [M]. 朱光译,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6.

[责任编辑 亦 策]

参考文献:

- [1] 李佳. 君臣关系与明代士大夫政治研究 [M]. 长春: 吉林大学出版社, 2018: 2.
- [2] 朱元璋. 明太祖集 [M]. 合肥: 黄山书社, 1991.
- [3] 张廷玉. 明史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0.
- [4] 商衍鎏. 清代科举考试述录及有关著作 [M].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3: 2.
- [5] 韩愈. 韩愈文集汇校笺注 [M]. 刘真伦, 岳珍, 校注. 北京: 中华书局, 2010: 261.
- [6] 朱光明. 从陈亮到方孝孺: 浙东学者关于正统的阐说及其流行 [J]. 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6): 12-18.
- [7] 永瑢.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5: 1773.
- [8] 宋濂. 宋濂全集 [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4.
- [9] 刘基. 刘基集 [M].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9.
- [10] 赵翼. 廿二史札记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4: 741.

[责任编辑 文 川]